

不晒预决算,就该被问责

王石川



今日论语

9月8日,财政部对外公布关于地方预决算公开情况的专项检查结果,截至2015年10月底,全国有36638个单位未公开2015年部门预算,56481个单位未公开2014年部门决算,占比分别为14.48%和22.27%。多地因未按规定公开部门预决算报告遭点名批评。

李克强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:“除法定涉密信息外,中央和地方所有部门预决算都要公开。”去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预算法明确建立了预决算公开透明制度。

所谓的预算公开,法律不仅明确了公开内容、公开主体,还明确了公开时间,“预算、预算调整、

决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其报表,应当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后20日内向社会公开”。根据财政部的点名,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2015年政府预算于2015年1月15日经区人代会批准,公开时间为2015年11月5日,晚了约9个月。

为数不少的部门不把新预算法当回事。不公开,或有客观原因,或有难言之隐。无论是不想公开还是不敢公开,只要不公开,就是违反新预算法,应该被问责。因为新预算法明确规定,“未依照本法规定对有关预算事项进行公开和说明的”,除了责令改正之外,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要追究行政责任。

谁来追究?应由同级人大或常委会来具体实施。全国人大常

委会委员、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说过,新预算法的一大亮点是,从过去的政府管理法转变为规范政府法、管理政府法,从过去“帮助政府管钱袋子”转变为“规范政府钱袋子”。人大既有审查权,也有监督权,对于不遵守新预算法的部门可依法处理。

不晒预决算,公众就不知道各级政府有没有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,有没有严格控制各部门、各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和楼堂馆所等基本建设支出。不晒预决算,公众就有理由怀疑,纳税人的钱没用在刀刃上,而是变为官员喝的茅台、吃的大餐,甚至揣进了一些官员的口袋里。而按规定,未将所有政府收入和支出列入预算或者虚列收入和支出,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被

给予降级、撤职、开除等处分。

问题是,如果相关部门不晒预决算,财政部没有检查,人大也没有监督,如何知道财政收入用之于民?

此外,财政部通报的问题主要涉及三方面,即部门预决算公开还有待进一步加强;公开内容的完整性和细化程度有待提升;基层预决算公开内容与社会关注不尽匹配。晒预算不能粗枝大叶,更不能故意含糊其辞。

晒不晒预决算,关乎能不能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,关乎能不能建设好阳光政府、责任政府,还关乎能不能打造透明财政、廉洁财政。掀开各级预决算的盖头,变“要我晒”为“我要晒”,政府花了多少钱、办了什么事,让公众明明白白,才能真正实现公共财政的公平正义。



新民随笔

居民自治

晏秋秋

鲜活的案例,在民间。

前天,新民邻声举办了上线后的第一场大型社区活动,邀请了全市30个街镇的代表,在上海居民自治论坛上,分享各自社区的居民自治经验。一一细听,感觉大有启发——通过充分引导,老百姓的智慧是无穷的。

在上海,社区问题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。然而,以往出现类似问题,总是由政府大包大揽解决。受此影响,目前对“小区事务怎么管,小区事务谁来管”,仍存在许多误区。

比如,从法理上说,物业是代表小区所有业主的业委会聘任的,所以,只能算是家庭的保姆,而绝非管家。家里有了矛盾,保姆可以出面调停,可以讲道理,但绝无判断是非的权力,更无执法权。所以,小区一出事就怪物业,有时候这是比较偏颇的。

再比如,近几年政府部门积极提倡公共服务进小区,希望的就是老百姓的水,能够由政府部门管到龙头,电管到灯头,绿化管到树头,煤气管到灶头,这样的话,小区物业也不至于一直被顶在“杠头”上。从这几年的探索来看,有进展,但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,还需加大力度。

真正的出路,看来还是在恰当的引导下,充分实现居民自治。老百姓就生活在小区中,业主们彼此都是邻居。对小区问题的症结,对左邻右舍的性格,居民了解得肯定更为透彻。换句话说,如果能够激发居民自治(而这也是物权法的应有之义)的热情,那么,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

在上海居民自治论坛上,我们听到了许多热人心的案例,但听到更多的,是一个社区,通过一套特定的居民自治的机制,管好了小区停车、急修、电梯、物业费缴纳等大问题。热心人不常有,而特定机制可以常有。这样的机制,可复制、可推广,由下而上,甚至可以形成覆盖一定区域的政策措施。

目前,新民邻声已打通全市214个街镇,并深度对接了96个街镇。社区是值得挖掘的富矿,“居民自治”是其中的金矿。相信在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的指导下,上海居民自治论坛,一定可以常办常新。

新民新语

为啥选“二打一”?

曹刚

闲来爱玩牌,水平不高,劲头不小,从流行的80分、“斗地主”到山东够级、安徽掼蛋,还有上海独有的大怪路子。身边同好者不少,电视台直播打牌,听说收视率颇高。

几天前的一则消息,让许多牌友大跌眼镜——全国竞技二打一扑克锦标赛在北京启动,主办方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宣布,以“斗地主”为原型的竞技二打一扑克获官方认可,成为智力竞技运动项目。

各类扑克赛事,在民间盛行已久,再获新认可,是突破,但不觉惊讶。奇怪的是,为啥选“二打一”?54张牌,3个人分,“地主”只多3张底牌,还要亮明。认识多个记牌高手,都觉得玩一副牌不过瘾,变化少,难度低。在上海,三打一和大怪路子明显更具人气。

趣味性棋牌游戏迈出重要的第一步,有那么多种类可选,为何偏偏挑了最简单的一种?二打一风靡全国,老少咸宜,规则基本统一。“简单”正是它的优势,技术门槛虽低,但容易推广和普及。

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官网公布的竞赛规则中如此定义“竞技二打一扑克”:牌手使用联网设备,通过竞技软件,采用复式赛制对抗的智力竞技扑克项目。原来,比的是电子竞技游戏,不用摸牌洗牌。插上互联网翅膀,影响力传得更快更远。

“复式赛制”则保障公平——所有打相同牌且方位相同的参与者横向比较。所以,真正的对手不在眼前,而是其他牌局中和自己拿了同一手牌的人。

比赛还传出一个信息:主办方与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达成战略合作。看来,商机无限。

我国体育产业方兴未艾,亿万级市场,谁不眼馋?围棋、象棋、桥牌等传统智力竞技,商业开发潜力有限;而以二打一为代表的民间趣味棋牌力量,得益于庞大的群众基础,有望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。

于是,规则简单、玩家众多的二打一,顺理成章地一手牵着体育总局,一手挽着互联网企业,大步迈向“加快发展体育产业,促进体育消费”的康庄大道。

权威声音

央视近日播出一则儿童安全用药的公益片,主人公承诺用手语诉说自己因用药不当致聋的经历。

在我国,儿童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约为12.9%,新生儿为24.4%,而成人是6.9%。长期以来,由于缺少儿童临床试验数据,儿童给药剂量多依据成人剂量,再通过体重换算、体表面积换算、年龄换算等方法来确定。按“小儿酌减”的原则,儿童多用的是成人药。

儿童要用儿童药,而不能按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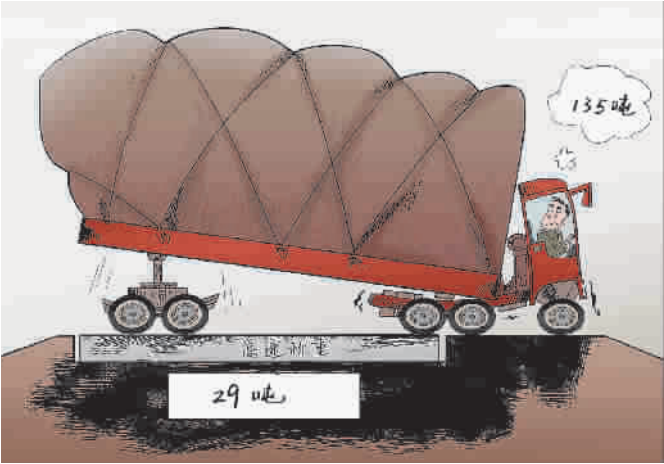
儿童要用“儿童药”

成人的量来模糊掌握,否则会给儿童的生命健康带来潜在威胁。所谓儿童专用药,是指适合儿童特殊体质及需求设计,利用矫味剂来改善入口的苦味,使小孩的接受度提高。另一特点是使用原包装,包装内附有剂量刻度的量器或喂食器,让家长方便掌握剂量,安全、方便、好入口。

儿童用药一直遭到生产厂家冷落。全国6000多家药厂中,专门生产儿童用药的仅10余家,有儿童药品生产部门的企业仅30多家。儿童用药开发周期较长,生产批量小、批次多,工艺也相对复杂,生产成本较高,利润太低。

国内儿童用药医疗市场90%以上的份额,被为数不多的外资企业如惠氏、罗氏、施贵宝等占领。发达国家在对儿童专用药品的开发、临床试验等方面都有相应政策支持,对药企给予税收、专利、市场和研究资助等方面优惠措施。国内需配套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。

儿童用药安全是一个社会性问题,医生资源不足、药品资源不足、终端服务能力不足、普通大众认识不足,是一个系统性问题,不是单纯改善某一个环节就能解决的问题,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协作。(王君平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

『称重技巧』

『百吨货车往前冲,安全隐患一重重。超载检查也不怕,原来自己会轻功。』货车在高速路收费站称重时,驾驶员只需轻轻一点遥控器上的按键,就可以使载重货车『瘦身』,装货一百三十五吨却只称出二十九吨。近日,四川路网特大偷逃通行费案件全部审理终结。七十余名大货车驾驶员利用液压设备大肆偷逃通行费,涉案金额高达三百多万元。曹一画

网视舆情

一个母亲砍杀自己的子女并且自杀,这样的家庭悲剧发生在甘肃康乐县,此事件最近在舆论中引发极大的反响。披露后舆论惊异于事件的极端恶劣性,自杀者的动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话题。此后媒体调查报道提供了大量的细节信息,为舆论分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,家庭极其贫困,因取消低保而自杀,这类猜测一度甚嚣尘上。不过很快部分猜测就被证伪,至今事件的发生逻辑还是一个未解之谜。

以往外界在解读农村自杀悲剧时,往往会提及情感纠纷、经济状况等因素,这类解读符合农村的现状,其实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这类判断。比如过去学者在研究

农村自杀悲剧谜团

何小手

农村妇女的自杀行为时,就普遍提到特殊角色(农民、妇女双重角色)给此群体带来歧视,往往是自杀行为的重要诱因。至于经济状况,更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变量,因贫致死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类似的判断通常会引申到养老层面。前些年农村老人的自杀行为一度成为热点话题,那时一种常见的分析就提到,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,农村老人面临养老压力,加之生活孤独,往往容易引发自杀行为。农村的种种不幸,很容易与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,这已经成为一种舆论惯性。

甘肃此次家庭悲剧发生后,舆

论聚焦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,传播最为广泛的一种说法是,当事人是因被取消低保而自杀,有说法还提到,当初之所以被取消低保,主要是因为这个家庭人缘不好,低保被有钱人领了。事件的后续发酵于是开始关注基层政府的低保政策落实情况,是否存在不公正行为等。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,事发地所属县为国家级贫困县,故此事件与扶贫政策一起拿来讨论,诸如“精准扶贫缺位导致甘肃一家六口服毒自杀”的分析评论颇为显眼,一些网友还提到,当地基层政府存在扶贫不积极的状况,近日,新闻也披露,国务院扶贫办介入甘肃农妇

杀四子女后自杀案件调查。

是偶发事件还是代表性事件,不同的答案会引发不同的分析,事件存在纵深发展的可能。而抛开经济层面的讨论,很多人也开始深入讨论农村自杀现象,这是继农村老人自杀受到关注之后,舆论又一次聚焦这一现象。一些数据被反复提及,比如说,在上世纪90年代,中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,而近年来有研究提到,中国自杀率大幅下降,农村妇女的自杀率降幅尤为明显。这些数据引发一定的争议,但有一个观点备受认同,即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被认为对农村妇女自杀起到很强的抑制作用。

一个家庭悲剧唤醒了外界对农村自杀现象的关注,这其中可能有误会,当然也不排除背后存在逻辑联系。当一些传统认知被逐渐证伪,可能就为深入看待问题提供了契机。